



月光城 随笔

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朱太平

《苏东坡传》这本传记首版于1947年，作者历时三年完稿，是林语堂最喜爱的一本书，原著用英文写成，译成中文，读起来虽然妙花纷纷，多少还有点译书的生涩。作者喜爱这本书，完全是他对苏东坡毫不掩饰地热爱使然，由热爱倾注而出的才情，自然鲜活灵动，引人入胜。

翻开这本书，不啻回到那个文人墨客云集、政治风云变幻的北宋年代。全书不仅记述了苏东坡波澜壮阔的一生，更是一部展现其诗词书画成就，以及他与当时文人墨客交往、政坛起伏、伟大人格与不朽功勋的生动画卷。沿着其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看去，他与同时代的一些著名人物的恩怨情仇交错辉映，构成了时代画卷中颇富特色的篇章。其中尤以与王安石的恩怨情仇最为典型。

本书的不足之处，就是对人事评价带有明显的作者倾向。

王安石无疑是对苏东坡的仕途与经历影响最大一个人。两人同时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序列、均负有盛名且惺惺相惜，但两人政见不同，争斗激烈且互不相让，差不多你死我活。

客观地说，林语堂至爱苏东坡，凡是与苏东坡为敌者，在他的文字中均遭笔伐，王安石首当其冲，他对苏东坡有多喜欢，对王安石就有多厌恶。在作者看来，王安石徒有忠君之情，空乏报国之志，且目空一切、独断专行，容不下政见不同者。是为大奸巨恶，并借苏洵之《辨奸论》大加鞭挞（苏洵1066年去世，而王安石1070年才升任宰相，有什么理由因王安石而写《辨奸论》？不解）。

王安石长苏东坡16岁，庆历二年进士。因不被仁宗看好，竟谢绝任命长达25年。期间虽未蒙圣眷，却收获了颖王赵頊的圣心。神宗时代，北宋已走过百年，因社会矛盾激化、民族对立（与西夏）严重及庙堂派系斗争激烈，已呈积贫积弱之态，年轻的神宗“慨然兴大有为之志”，立志“雪数世之耻”，熙宁二年（1069），刚刚登上帝位的宋神宗（22岁的赵頊）与他的偶像（49岁的王安石）经过一番深谈之后，共同开启了大宋的变革时代。

恰恰也是熙宁二年，苏轼、苏辙兄弟到达京师。是年始，中国在政潮汹涌中卷入最后一次国家资本主义实验。也即自是年始，苏东坡便在王安石变法的时代背景

下，拉开了个人大起大落、波澜壮阔的人生大幕，直到1101年去世，他的人生起伏都与王安石变法这个大的社会背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这是王安石推行新法时著名的“三不足”论断，既是他个人思想的体现，也是变法的根本遵循。为此，他获得了个“拗相公”的雅号。他的变法线条是“新法改革——积聚财富——出兵河熙——扫平西夏——征服辽国——产出利润”。理想很丰满。以青苗法、免役法等措施为代表的新法，其宗旨是富国强兵，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推动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果，如加重了百姓负担、引发了新旧党争等。很多史学资料表明，北宋灭亡，即从王安石变法开启了倒计时。

显然林语堂即持此论。尽管王安石变法充盈了国库，强盛了军事力量，但由于用人失察、新法未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特别是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实行的七八年时间，社会矛盾激烈、民怨沸腾。王安石也两度罢相。

与改革派相比，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认为，社会总财富有限，所谓富国者，无非是从农民手中掠夺财富以入国库，增加农民负担而已。而新法所带来的后果之一，确然使底层人民饱受其害，甚至倾家荡产。作为保守派的得力干将，苏东坡向来关注社会和人民。他对新法的危害怒不可遏，两次上书神宗，未获答复，又于熙宁四年（1071）写成四千字的《上神宗皇帝书》，以30岁初露峥嵘的雄姿，雄辩滔滔、洋洋洒洒，力陈变法之危害。随后王安石在御史台清除异己，一个月清除了十四人。苏东坡接连上书鞭挞未果，遂以告院权开封府推官的身份，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彻底激怒了王安石，立遭罢黜，外放杭州通判。

自1071年至1085年神宗驾崩，15年间，苏轼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常州、登州等地先后任职，或迁或贬，辗转迁徙，“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期间苏、王二人亦有互动，因政治对立，多有龃龉，主要是王对苏的打压。

1079年8月至12月，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入狱，差点丢了性命。在新党纷纷

给朝廷施压要杀苏东坡时，虽然苏东坡是其主要政敌之一，王安石仍奋然上书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而此时王安石已然第二次罢相。

林语堂因对王安石厌恶之重，书中竟于“乌台诗案”王安石对苏东坡施以援手之事一字未提。

苏东坡经历的多次贬谪和复起，几乎都与变法相关联。这些经历，使他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社会的黑暗面和人性的复杂性，同时，也使他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农夫走卒，多有稔熟相知者。除初去京师知杭州时，因初遭贬迁，政治理想遭遇挫折而略嫌消极及“乌台诗案”之初因担心连累朋友曾有自杀念头外，均以乐观通达的心态面对新地。每到一地，必使自己尽快适应，“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十五年间，东坡生活颇多波折，但他并不以之为意，“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其中杭州与黄州，是苏东坡诗文足傲青史的两地。《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千古名篇均是此间的产物。元丰四年（1081），谪居在黄州时，苏东坡开始在房屋东坡的一片田地里务农，始号“东坡居士”，成为真正的农夫，并写诗为证：“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东坡去世70年后，约1170年，后辈陆游造访，尚见到雪堂正中间挂着一张由米芾画的东坡像。

名士风采，虽务农也是诗。

元丰七年（1084），神宗下手诏说：“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于是把他从黄州团练副使，改任离京城较近的汝州团练副使。是年八月，在赴汝州途中，苏轼到达金陵，拜访归隐的王安石，流连月余，步韵和了王安石多首诗，此为其中一首：“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细嚼此诗，感慨至多，千古政敌，至此飘然去恶，转为惺惺相惜。（王安石退隐后常骑驴，此时既老且病。劝苏轼在金陵买三亩宅安身相伴。最后一句特别值得斟酌。诗贵情、情贵真。）

一个月后，苏轼渡江北上，王安石送走东坡，喟然长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以名士为对手，亦卓然超绝。这些美好的细节，文中亦未提及。

1085年，神宗去世。年仅9岁的哲宗继位。次年，即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轰轰烈烈的熙宁改革，最重要的两位主角先后离世。而继任的哲宗年幼，朝政专于宣仁太后（高太后）之手。高太后是新政的反对者（王安石第一次下野，即与高太后有关），垂帘听政后，即擢拔司马光为相，全面废止新法，并清理新党成员。元祐党人渐次把政。

同年（1086），苏东坡抵京，短短八个月内，他三次擢升，由四品中书舍人升为三品翰林学士知制诰，那期间的重要圣旨多出自东坡之手。在全面清除李定、吕惠卿等新党成员的同时，苏东坡对四月份去世的王安石却颇多褒奖。他在追赠荣衔的圣旨中盛赞王安石：“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胡不百年，为之一涕。”

在林语堂的眼里，选择的文字却是“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并以之为反面的诽谤。以此观之，语堂先生之爱憎分明，确然性情中人也。

民间传说中，苏、王交往颇多喜剧色彩，比如《警世通言》中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其间的一个典故，是否可以作为两人一生交往的总结？至于真与不真，倒在其次了：

王安石有一首没写完的《咏菊》诗，开头两句是：“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苏东坡看后，不以为然，心想，菊花敢与秋霜战，至死焦干枯烂，并不落瓣，怎么会“吹落黄花遍地金”呢？于是依韵续诗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王安石见到续诗，想到苏东坡不晓得黄州菊花落瓣，也怪他不得，于是密报天子，调他到黄州当了个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当官一年，一日重九之后，苏东坡与好友陈季常到后花园赏花，不禁大吃一惊，只见菊花棚下，满地铺金，枝上全无一朵。至此方知，同为菊花，竟也有落瓣与不落瓣之分。